

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

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尚未出現所謂閱讀「大眾」，讀者間存有城鄉、階級等的身份差異問題，因此本文將討論對象設定以日語作家為主的知識份子，試圖梳理他們的閱讀經驗，從物質文化層面探討他們的閱讀材料與當時日本內地的出版文化產業的關係，即日本國內為消解書籍生產過剩的壓力，出版業者如何藉由書籍販賣的管道，將帝國的知識體系傾銷到殖民地，而殖民地知識青年又如何借力使力，藉由大量閱讀積累自己的文化資本，建構屬於殖民地的知識體系，展開本土文化論述。

本文首先將探討殖民地宗主國的出版型態，如昭和初年「圓本」(えんぼん)與文庫本的譯本大量出版，使得昭和知識份子不必如明治知識份子般的閱讀原文書方能獲取新知，而是透過譯本直接迅速廣泛粗淺地涉獵歐美文化。而這樣的物質資源究竟提供殖民地知識份子怎樣的閱讀可能？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和日語的普及，台灣的讀書市場成為日本內地書商銷售過期雜誌和二手書的重要市場之一，因物質性文化資源的流通，提供了殖民地知識份子怎樣的閱讀文本？他們又如何取得這些資源有效地轉化積累個人的文化資本，以作為殖民地現代

化的知識基礎。其次，筆者將以日治時代台灣作家的藏書與個人日記為研究資料，說明戰前台灣知識份子可能的閱讀內容，釐清他們如何透過日譯本的閱讀建構個人的知識體系。最後，將探討於戰時「支那」相關書籍出版熱潮中，他們又進行怎樣的閱讀以建構其「支那」相關知識？以期勾勒出戰前殖民地知識份子的閱讀私史。

關鍵詞：閱讀、物質文化、翻譯、支那

**The private/self (私 wadasi) reading
history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under
Japan rule:
Focusing on Taiwan Japanese Writers**

Wang, Hu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ading “public”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hadn’t disappeared in Taiwan, there were identical differences such as urban and rural, and classes, etc. among the readers.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about the Taiwan Japanese writers, trying to car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reading material and contemporary Japan mainland publication industry, that is, to mitigate the pressure of overproduction of books in Japan mainland, the publication industry dumped the knowledge institution of the Japan empire to the colony through the trafficking pipeline of books. The essay will also discuss about how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of colony traded on its strength accumulating their own cultural capital

through considerable reading, thus to build the knowledge system belonging to the colony, and to expand the discourse of local culture.

This essay will firstly investigate the publication forms of the colonial sovereign, such as the great amount of publication of translation of the “*enhon*” (圓本, えんぼん) and pocke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Showa (昭和) era, which made the Showa intellectuals dabble at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es directly and rapidly, and thi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Meiji (明治) intellectual who could get new knowledge only through reading the original texts. After all, what reading possibilities did this material resource provide for the colony intellectuals? With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territory and the widespread of Japanese language, the Taiwan reading market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arkets to which the bookmen in Japan mainland sold overdue magazines and secondhand books. What kinds of reading texts did the colonial intellectuals get through the circula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resource? Furthermore, how did they transform these resources into individual cultural capital, which were to be the knowledge basis for modernization of the colony? Secondly, the book collections and dairies of the Taiwan writers during Japan governance period will be my research material. I will illustrate the possible reading content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and explain how they built individual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reading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Finally, I will discuss about how they build the knowledge of “Sina” in the upsurge of publication about Sina during wartime. I anticipate that I could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private/self reading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under Japan colonial rule.

Keywords: reading, material culture, translation, Sina

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

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¹

一、前言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場域中的知識體系主要可分為中文（古典／白話）和日文兩部分，隨著帝國統治時間的增長，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制定「國語普及十年計畫」之後，日文人口與日俱增，緊接著「皇民化運動」的推動之後，到了一九四二年全台日語的普及率已達 60%²。可知，由於帝國殖民地教育政策的逐步落實，進而培養出新的日文閱讀消費群。反之，中文圖書市場卻在總督府的圖書檢閱制度、讀者減少、書籍輸入不易等負面因素的影響下日趨萎縮³。由於島內日文出版品並無法滿足這群新興的日文讀者的閱讀需求，他們轉而直接訂購日本內地的書報或以其他方式取得閱讀資源。

閱讀慣習的養成與個人家庭的社經地位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根據當時台灣知識菁英的回憶錄⁴，可知他們大多自幼因家庭經濟條件較為優渥，在購讀無虞的學習環境中，培養自己的閱讀興趣，累積文化資本（lecapital culturel），進行文化「再製」（reproduction）以利個人的社會階級⁵。相較於這群菁英，一般青少年到圖書館閱讀課外讀物的情形，卻不盡理想。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生閱讀課外讀物的學生雖逐年增加，但因升學考試的關係，五、六年級的學生大都因準備升學，

¹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日治時代台灣作家的文化教養問題〉(NSC95-2411-H-126-010)之部份成果，承蒙補助，謹此致謝。

² 台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編，《大東亞戰爭と台灣》（台北：台灣總督府，1943年）。

³ 關於日治時期中文圖書出版販售情況可參閱春丞（黃邨成），〈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下）《臺北文物》3-2、3-3（台北：台北市文獻會，1954年8月、12月）、蔡盛琦，〈日治時期台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91-2（2002年12月），頁65-92。

⁴ 如范昭明《少年李登輝》的〈少年俱樂部的誘惑〉（台北：商周文化，1995年），頁154-160；楊銓基〈我的課外讀物〉，《楊銓基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40；張文義，《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年），頁77-78。

⁵ 關於文化「再製」的相關定義討論可參閱丘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出版，1998年3月），頁13-15。「再製」一詞係指社會階級運用各種經濟和文化資源，以維繫自己世代地位的現象和過程。

而以閱讀參考書為主，而預計就職的學生由於閱讀對其日後忙碌的生活無益，因此與閱讀活動更形疏遠⁶。在台勤於閱讀者大都屬於受過教育的中上階層，因受限於語言和經濟問題等，誠如日本內地的一般「閱讀大眾」並不存在⁷。

在日本都市的讀書階級與農村的讀書青年在閱讀型態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農村青年只能利用農閒閱讀講義錄刻苦自學，或參加青年團借閱輪讀一般雜誌和與農業相關的資訊⁸。同樣地，在殖民地台灣亦存有城鄉、階級等的身分差異問題，因此本文將討論對象設定以日語為知識語言的新知識份子，試圖梳理他們的閱讀經驗，從物質文化層面探討他們的閱讀材料與當時日本內地的出版文化產業流通的關係，即日本國內為消解書籍生產過剩的壓力，出版業者如何藉由書籍販賣的管道，將日本國內建置的知識體系傾銷到殖民地，而殖民地知識青年又如何借力使力，藉由大量閱讀積累自己的文化資本，建構屬於殖民地的知識體系，展開本土文化論述。

本文首先將探討殖民地宗主國的出版型態，如昭和初年「圓本」(えんぽん)與文庫本的譯本大量出版，使得昭和知識份子不必如明治知識份子般的閱讀原文書方能獲取新知，而是透過譯本直接迅速廣泛粗淺地涉獵歐美文化⁹。而這樣的物質資源究竟提供殖民地知識份子怎樣的閱讀可能？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和日語的普及，台灣的讀書市場成為日本內地書商銷售過期雜誌和二手書的重要市場之一，因物質性文化資源的流通，提供了殖民地知識份子怎樣的閱讀文本？他們又如何取得這些資源有效地轉化積累個人的文化資本，以作為殖民地現代化的知識基礎。其次，筆者將以日治時代台灣作家的藏書與個人日記為研究資料，說明戰前台灣知識份子可能的閱讀內容，釐清他們如何透過日譯本的閱讀

⁶ 加藤春成，〈青少年と讀書〉，《台灣時報》231（1939年2月），頁60-66。

⁷ 中島利郎，〈第五章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文學（一）—台湾の「大衆文学」について〉，《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序說》（東京：綠蔭書房，2004年3月），頁127-146。這裡所指的「閱讀大眾」即如中島所指出的，這群讀者必須透過文字可以理解教育制度所確立且充實的「國語」或母語，有購書的金錢餘裕和時間餘裕，而且具閱讀興趣，非屬文學青年一類，而是一般有些教養的生活者。但在台灣除了富裕家庭出身者之外，一般人對閱讀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⁸ 高田知和，〈農村青年の讀書經驗に関する個人生活史的考察〉，《出版研究》33（2002年），頁147-170。

⁹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譯と日本の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1月），頁53-60。

建構個人的知識體系。最後，將探討於戰時「支那」¹⁰相關書籍出版熱潮中，他們又進行怎樣的閱讀以建構其「支那」相關知識？以期勾勒出戰前殖民地知識份子的閱讀私史。

二、書籍資源的取得

日本內地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出版業者為吸納重建事業資金，刺激民眾購買書籍的慾望，大量廉價發售「圓本」（一圓一本）和文庫本（口袋型書籍），由於出版品的量化，使得讀書行為不再是貴族們的專利，轉而流行普及於一般大眾之中，特別是都市的一般受薪階級，讓他們得以隨時輕易購書閱讀，進而達到讀書大眾化的效果，產生所謂的「讀書階級」¹¹，同時也因「新中間層」¹²的讀書階級的出現，而促使日本讀書消費市場更形活絡。

「圓本」全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改造社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¹³，它的廣告資訊的流通在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台灣只有數日之差，在此全集刊行之後，其它的「圓本」全集廣告亦陸續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刊載。雖然島內的購讀能力和消費總量，無法與內地的讀者群相提並論，但就圖書資訊傳遞的時效性，並未出現太長的延遲。內地的出版社為爭奪出版銷售市場，各家紛紛競相發行全集類的叢書，最後竟出現供需失調生產過剩的現象，為消解庫存壓力，書商轉而將那些庫存書籍、二手舊書和過期雜誌運往海外殖民地販售¹⁴。

若從殖民地作家的藏書來觀察殖民地知識份子的閱讀經驗，如龍瑛宗藏書、賴和藏書、楊雲萍藏書、《呂赫若日記》¹⁵中的購置書單等紀錄中，皆可發

¹⁰ 本文中的「支那」一詞援引戰前日人對「中國」不帶歧視意味的稱呼用法，故以「」標誌。

¹¹ 永嶺重敏，〈第六章サラリーマン読者の誕生〉，《モダン都市の読書空間》（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2001年3月），頁203-243。

¹² 「新中間層」泛指大正末年、昭和初期由受中高等教育者所共同形成的獨自生活型態、價值觀、趣味嗜好，具階層性的文化集團之文化菁英。竹內洋，《學歷貴族の栄光と挫折》（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頁312。

¹³ 改造社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菊判，各卷平均500頁，注上6號的假名小鉛字，三段組一冊一圓，從大正15年（1926年）到昭和6年（1931年）為止，共發行62卷和別卷共63卷。在台灣於1926年11月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上首見該全集之廣告。

¹⁴ 參見拙著〈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養問題——以龍瑛宗為例〉，《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年4月），頁47-71。

¹⁵ 呂赫若，《呂赫若日記》（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

現他們都藏有改造社和春秋社等所發行的「圓本」全集叢刊。姑且不提廉價傾銷至台的「圓本」對殖民地讀書市場的功過，如因大量日文譯本的流通，易使台灣文化界欠缺以在地語言翻譯西方知識，進行文體或在地知識近代化的動機。但因「圓本」在殖民地的文化場域的流通，刺激殖民地青年的大量閱讀的慾望，如此的購讀行為也成為同時代作家共同的藏書經驗。也就是說，昭和初期的「圓本」熱潮隨著帝國殖民勢力擴及殖民地並發揮其影響力，成為容易取得的閱讀材料，提供殖民地知識份子系統性的知識內容。

購書閱讀的消費行為是當時「新中間層」累積文化資本藉以「立身出世」的重要手段。購書、讀書、藏書有其階級象徵的意義，這樣的行為被視為知識菁英的一種身分上的矜持，「書籍」象徵著他們作為讀書階級的社會威信¹⁶。因此〈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作者有意突顯陳有三的書籍費占總薪資的八分之一，另一位重要人物社會主義青年林杏南之子也自述購讀內容，箇中原因不外乎作者想要以購書閱讀作為強調身為殖民地新興知識份子的身分表徵。但很顯然地，閱讀近代「知識」並未替他們謀求真正的幸福，反成為他們痛苦的根源，最終仍未擺脫被殖民者的宿命，抑鬱而終或在昏暗的殖民空間中承受生命的挫敗。

根據龍瑛宗（1911～1999）¹⁷、王詩琅（1908～1984）¹⁸、楊逵（1906～1985）¹⁹此一世代的回憶，可知殖民地的台灣知識青年們取得書籍的管道，除了因留日關係直接在日本內地購讀、郵購，或向圖書館借閱之外，購讀舊書和內地傾銷至殖民地的廉價舊書報是他們在台取得閱讀資源的重要管道。例如，王詩琅為彌補個人學歷上的不足，與內地的農村青年一樣，直接向內地書店郵購中學講義錄自學。在《台灣日日新報》也經常可見到早稻田出版部的講義錄廣告，自學者可能因講義錄內容艱澀半途而廢，但卻也刺激他們自學的慾望。雖然如教科書般的講義錄與一般書籍的性質不同，但它們皆是承載了自帝國輸往殖民地的文化知識。

¹⁶ 永嶺重敏，《モダン都市の読書空間》。

¹⁷ 龍瑛宗，〈讀書遍歷記〉，《民眾日報》（1981年1月28日）。

¹⁸ 王詩琅，〈我的苦讀〉，《民眾日報》（1980年12月20日）。

¹⁹ 戴國輝，〈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陪內村剛介訪楊逵於東京〉，《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探索》，（台北：南天，2002年）。

對受限家庭經濟條件而無法留學的本島青年而言，廉價舊書或「圓本」套書便成為滿足他們求知欲和累積自我文化資本的重要素材。藉由系統性全集式的大量閱讀提升知識的質量，以期趨近日本內地的一般知識階層的水準。對殖民地青年而言，在殖民地社會制度中存有許多壓抑和差別性待遇，但在知識領域裡他們仍試圖透過汲取現代新知進行知識武裝，以期擺脫帝國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箝制，並反省思考台灣社會內部文化的後進性等問題。

在台流通的書籍都得接受台灣總督府嚴格的檢閱²⁰，其中，單行本的左翼思想書籍雖遭到查禁，但涵括於《世界大思想全集》（春秋社）等圓本全集中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性的書籍，仍散見於一些個人藏書中，如龍瑛宗的藏書《世界文学と無産階級》²¹、《世界大思想全集第47卷》²²等。河原功則從吳新榮的剪報集中，爬梳他如何在總督府嚴格的檢閱制度之下，從綜合性雜誌或左派雜誌中汲取左翼思想²³。因此，可知在社會主義思潮席捲世界之際，台灣知識份子仍透過各種可能的閱讀管道培養個人文化教養並武裝反抗思想。

三、殖民地作家的藏書記憶

戰後帝國政權退場、國民黨政權入主台灣之後，戰前知識份子的左翼閱讀材料、圓本全集大都因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深怕受累而被焚毀化為灰燼塵土²⁴，目前只能透過僅有的作家藏書或日記，在歷史的皺摺處翻閱屬於他們的帝國藏書記憶。

在視訊媒體尚未出現的日治時期，書籍閱讀是一般人吸收現代新知的主要管道。書籍的流通直接影響到讀者的閱讀內容，因此解開殖民地作家的藏書密碼，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閱讀經驗。因為這些閱讀經驗

²⁰ 河原功，〈日本統治期台灣での「檢閲」の実態〉，《東洋文化特集：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檢閲体制－韓国的事例を中心に－》86，（東洋學會，2006年3月），頁165-214。

²¹ フンツ・メーリンク著，川口浩譯，《世界文学と無産階級》（東京：改造社，1929年12月）。

²² ベルンシュタイン著，松下芳男譯，〈マルキシズムの改造〉；カウツキー著，山川均譯，〈マルキシズム修正の駁論〉（東京：春秋社，1928年10月）。

²³ 河原功，〈吳新榮の左翼意識「吳新榮旧蔵雑誌抜粹集（合本）」からの考察〉，《2007年台日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2007年9月8-9日），頁108-113。

²⁴ 劉捷，《我的懺悔錄》（台北：農牧旬刊社，1993年），頁130；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呂赫若日記》（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4年），頁492。

影響著殖民地青年對自我未來的想像。以黃得時的閱讀經歷為例，他曾於東京舊書攤購得高須芳次郎〈東洋文藝十六講〉、萬裏閣發行的《大支那大系》〈支那戲劇篇〉和岩波書店《漱石全集》，而影響他決定求學的方向²⁵。也在這樣的因緣下使他成為當時台灣少數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戰時以翻譯《水滸傳》著稱。以下試圖分析賴和、龍瑛宗藏書，以探究殖民地作家的閱讀活動，打開殖民地時代的圖書記憶，期待能夠與他們的閱讀經驗相逢。

《賴和紀念館藏書目錄》中的書籍以賴和的藏書為主，但其中部分雜有家屬如賴賢穎等人的藏書。中文藏書分為「工程」、「中國文學」、「中國哲學總論」等²⁶，其中以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小說月報叢刊）和西方文學的中譯本數量最多。在雜誌期刊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期刊收有《小說月報》、《現代評論》、《甲寅》、《語絲》、《莽原》、《駱駝草》等。這些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報雜誌資料主要是曾在北京大學留學的賴賢穎寄送給賴和的，而賴和又將這些雜誌置於客廳供其它友人如楊逵、吳慶堂、楊守愚等人閱讀。因此可知，中國現代文學的知識透過留中學生的寄送挾帶，擺置於台灣知識份子的藏書中，成為他們文化裝置的一部分，而這些文學雜誌的作品甚至成為賴和創作甚為重要的參照資料，如魯迅〈過客〉「走」的意象曾出現於賴和的〈前進〉²⁷，而徐玉諾刊載於《小說月報》和《晨報副刊》上有關生死主題的作品亦對賴和的創作有直接的影響²⁸。可見，書報物質文明的流動對於作家創作有其深刻的意義。

日文藏書中除了一般書籍之外，他還收藏了多套圓本全集（雖然並未收全）譬如：神田豐穗編的《世界大思想全集》（東京：春秋社，1927年），神田豐穗編《大思想インサイクロペヂア》（東京：春秋社，1930年），佐藤義亮編的《世界文學全集》（東京：新潮社，1930年），近代社編的《世界戲曲全集》（東京：近代社，1927年），《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改造社，1926～1929年）、《世界美

²⁵ 黃得時〈晴園讀書雜記〉，《台灣文學》第2卷第1號（1942年2月），頁200-204。

²⁶ 該目錄的分類並未根據一般的圖書分類法，類別細項太多而顯得雜亂無章，有待進一步重新分類整理。

²⁷ 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頁304。

²⁸ 秋吉收，〈賴和與徐玉諾——「台灣的魯迅」與大陸新文學的關係〉，《彰化文學大論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7年11月），頁120-142。

術全集》(平凡社)等。此外尚有,作家全集《フィリップ全集》(東京:新潮社,1929年)、トルストイ全集(東京:改造社,1939年)等;同時,也藏有不少岩波書店等出版的文庫本,足見昭和初年的帝國書籍出版品「圓本」和「文庫本」,儼然成為殖民地知識份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裝置。若細究書籍內容,可發現其中夾雜了不少社會主義思想的相關書籍。從賴和與賴賢穎的藏書內容,可察覺殖民地兼具舊漢文素養的新文學運動者透過中文的書報閱讀,進行對中國新文學運動內容的瞭解,以資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的參考,同時也透過日文譯本等的閱讀資源獲取西方文化新知與並開拓其世界視野。

龍瑛宗是日治時期少數的藏書家之一,因為戰前日語是他主要汲取知識的語言,所以戰前的藏書以日文書籍為主,他的日記、創作與藏書的關係皆有跡可尋²⁹,他常將摘錄個人的閱讀筆記放入作品中,甚至直接轉引閱讀內容於小說、評論中。他在座談會上關於「私淑作家及其理由」³⁰的話題中,自道「少年時屠格涅夫、之後是果戈裏,最近則是關心左拉。」可見,外國文學是他主要學習模仿的對象,對其作品風格影響甚深。戰後在〈讀書遍歷記〉一文中業已詳細地陳述他的讀書經歷,在此不再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戰前除了魯迅文學之外,龍瑛宗鮮少論及中國現代文學,直到戰後初期編輯《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時,為因應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之需,方才提出自己對於中國文學、政治、歷史等的見解,而那樣的知識內容並非是戰後建置的,而是在戰爭期間閱讀「支那」相關書籍和中國現代文學等的日譯本,所積累的知識,對於中國現代文學他則是以西歐文學作為評斷標準進行評論³¹。關於中國社會的發展他則認為:

現在的中國文化是不足以向世界誇示什麼的落伍國家,但過去卻有優良的文化,但中國的歷史性發展,因『亞洲式生產模式的停頓』與世界帝

²⁹ 參見拙作,〈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養問題——以龍瑛宗為例〉,《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頁47-68;〈浴火鳳凰——關於龍瑛宗的台南時期兼論《女性素描》〉,「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中文系,2003年10月18日),頁183-207。

³⁰ 〈台灣代表的作家的文芸を語る座談会〉,《台灣藝術》第3卷第11號(1942年11月)。

³¹ 王惠珍,〈龍瑛宗の読んだ中国文学——日本語の翻訳による受容〉,《中國文學會紀要》27(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2006年3月),頁131-150。

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步上嚴重的破滅性經濟破壞的過程，再加上上部構造政治的腐敗，中國文化因此開始停頓退後。³²

可知，他深受戰前黑格爾的「亞洲式生產模式的停頓」的論調所影響，此論調是日本明治以來支撐脫亞入歐的國家戰略的中國認知，即所謂「東洋式的停滯」、「東洋式的專制」的概念，如此的中國認知為昭和知識份子對軍事性侵華，而帶來中國舊社會的解體與更新之歷史實踐，提供正當化的理論³³。亦由此可知，誠如葉榮鐘所言：「臺人對祖國的實情，所可能的入手資料皆是經日人剪裁、染色的加工品。」³⁴戰前台人的中國觀因受戰爭期的日本「支那學」傳播內容的影響，而受到帝國之眼的影響，有其偏頗之處。

自認學歷不足的龍瑛宗除了進行前述的左翼閱讀之外，亦藏有不少與教養主義相關的書籍。與台北高校學生社團「新聞部」發行的刊物《台高》第十八號「讀書傾向調查」³⁵中羅列的教養書籍進行比對，則可發現相關書籍在他的藏書中皆可尋獲。特別是河合榮治郎的著作，譬如入選讀書傾向調查單項的《学生と科学》、《学生と教養》、《学生と生活》、《学生と歴史》、《学生と生活》等。從這份問卷調查可知在昭和教養主義的影響下，當時台北高校學生的知識水準與閱讀內容與內地高校生的差異性並不大，而勤於自學的他也以這些書籍提升個人的文化學養。昭和十年代起教養主義雖經歷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時代，但在高校生中仍相當盛行，其中以河合榮治郎的一系列的「學生と〇〇」學生叢書系列，五年間不斷地出版，並且成為最暢銷書籍，成為對於昭和十年代日本舊制高校生、大學生的教養主義方面影響甚鉅。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學生教養刊物與帝國主義的宣傳讀物間存有對抗效果，並使學生對人性有較深入的洞察³⁶。

³² 龍瑛宗，〈中國古代の科學書——宋應星の《天工開物》〉，《中華日報》（1946年9月16日）。

³³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7月），頁141-142。此論點乃是子安參閱秋澤修二的《支那社会構成》（東京：白揚社，1939年）所作出的結語。

³⁴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葉榮鐘全集2 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2000年8月），頁447。

³⁵ 引自蔡錦堂，〈日本治台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台灣菁英的誕生〉，《2007年日台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亞東關係協會、國史館，2007年9月8-9日。）

³⁶ 筒井清忠，〈近・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教養主義成立と展開〉，《社會科學研究》第20卷第1

同時，亦可窺知如龍瑛宗這樣的日語世代如何透過自學閱讀學生教養書籍提升自我的文化教養。賴和與龍瑛宗各屬殖民地不同世代的知識份子，從他們的藏書內容可知他們受限於世代及語言的關係，各有偏好，但同時也反映出中、日文書籍在台的流通消長與他們的藏書／閱讀／創作活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亦對他們知識的選擇取向產生莫大的影響。

四、總力戰時的「支那」閱讀

日本出版界為因應帝國「興亞」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時局宣傳之需，而趁勢大量地出版翻譯所謂「支那學」的叢書，如創元社的「支那叢書」、人文閣的「支那文化叢書」、岩波書店、東成社的「現代支那文學叢書」等。總力戰期間有關「支那」的思想、習俗、文學等概說性的書籍大量地被譯出，雖然書籍或譯者的水準良莠不齊³⁷，但它畢竟帶動了「支那」熱。吉川幸次郎卻認為這樣支那學的熱潮，是「外熱內冷」的現象。因為即使有大量支那書的翻譯，但誤譯的現象卻隨處可見，甚至連汪精衛的聲明出現嚴重的誤譯，竟也被刊載在報紙上。對支那問題的關心其實是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需求罷了³⁸。姑且不論譯本良莠的問題，但總力戰時期「支那」翻譯熱的影響不只在日本內地的中國認知，亦刺激殖民地知識份子如呂赫若、吳新榮等人購讀「支那」研究的興趣，滿足他們閱讀中國的慾望。雖然這些知識內容難免受到戰爭時局的影響，例如第一書房刊行者長谷川巳之吉，發表所謂的〈戰時體制版的宣言〉，說明：「本戰時體制版涉及思想、藝術、宗教等文化各方面，貫古今東西只要是對現代日本最要緊具重大意義的名著，將計畫普及。」³⁹這些著作的「支那」大都是統攝在「東洋」範疇之下，以「興亞」為名義，建立日支兩國文化與國民情感上的聯帶關係。如：「支那詩人的情感引起與同屬東洋人的日本人的共鳴，充

號（2000年3月），頁1-20。

³⁷ 竹內好，〈翻譯時評〉，《中國文學》68（1940年12月），頁314-319。

³⁸ 吉川幸次郎，〈翻譯時評〉，《中國文學》76（1941年9月），頁256-261。

³⁹ 長谷川巳之吉，〈戰時體制版的宣言〉，上村忠治著，《詩人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東京：第一書房，1941年9月），廣告頁（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葉榮鐘贈書）。

滿東洋式趣味的詩興，滿足了我們的趣味」⁴⁰、「(支那) 儒教重視剛健正大之風，無可否認成為廣義的東洋精神正面的思潮，如此說來，和日本人尚武一樣有其溫柔的地方，崇尚自然不能說沒有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⁴¹等。戰時日本的「支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知識直接影響到戰時台灣知識份子的中國認識，也間接地影響他們在戰後初期時面對中國接收政權的態度。例如後述石藤丸太的《蔣介石》⁴²，身為朝日新聞的記者力求對傳記人物進行客觀記述，將重點置於滿洲事變至西安事變有關的蔣介石事蹟。蔣介石因西安事件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促使該著作的出版，他雖然稱頌蔣介石偉大，但是仍未能跳脫戰時中國領袖蔣介石和中華道統繼承者的認知。如後述台灣知識份子吳新榮卻以英雄政治家來評斷他。因此，關於戰後初期台灣菁英如何認識中國，將留待另文再行討論。

日記是瞭解記主個人生活經驗的重要題材，從作家日記裡則可一窺作家閱讀私史和創作歷程，以下試就《呂赫若日記》⁴³與《吳新榮日記全集》⁴⁴戰時日記的內容為考察對象，試圖釐清他們戰時「支那」閱讀的實際情況。

《呂赫若日記》(1942~1944) 寫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戰爭動員如火如荼地展開之際。根據日記內文，可知他的戰時創作情形與購讀傾向。因地利之便他亦向中央書局借閱綜合雜誌《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和文藝雜誌《新潮》、《知性》等。在專書閱讀方面，他則以戲劇理論與文學作品為閱讀重點，除了博覽日本文學和日譯本的世界文學之外，對中國傳統戲劇、通俗小說亦展現出高度的興趣，譬如：《還魂記》、《好逑傳》、《桃花扇》、《清宮二年記》、《今古奇觀》⁴⁵、《三國志》等，以及中國現代文學如林語堂的《京華煙雲》、

⁴⁰ 上村忠治，〈支那の心〉，《詩人を通じて支那文化》(東京：第一書房，1941年9月)，頁11。

⁴¹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攝取に就いて〉，《支那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43年11月)，頁578。

⁴² 石藤丸太，《蔣介石》(東京：春秋社，1937年1月)。

⁴³ 呂赫若，《呂赫若日記》(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4年)。本文參考譯文，另行改譯部分，文責筆者自負。

⁴⁴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年)。本文參考譯文，另行改譯部分，文責筆者自負。

⁴⁵ 在《台灣文學》第3卷第2號和第3卷第3號中可見清水書店所出版的《今古奇觀》的廣告，廣告文〈著者の言葉〉中還特地提到：「現在是大聲疾呼新東亞建設的時代，為了

老舍的《駱駝祥子》等日譯本。當時雖已有松枝茂夫譯的《紅樓夢》(岩波文庫, 1940年)⁴⁶, 但呂赫若亦計畫翻譯《紅樓夢》, 這或許與他的描寫台灣人家族生活的創作主題有其內在關係。

戰時呂赫若在日記中明言, 希望藉由「有關中國的書籍閱讀, 來看臺灣生活」(1943年2月10日), 但因語言和譯本的限制, 使得他的閱讀題材大都侷限於古典通俗小說、戲曲方面, 對於現代中國小說的涉獵則較少。同時, 他也比較東西方小說與日本小說間的差異, 認為「短篇小說當以日本為範本, 長篇小說當學西洋、支那。」(1943年5月22日)而「研究中國非為學問而是我的義務, 是要知道自己。想寫回歸東洋、立足於東洋的自覺的作品。」(1943年6月7日)他在戰時東洋回歸的思想基礎下, 展開具批判性的「支那」閱讀。除此之外, 他對於戰時「支那」的相關知識如卡爾·庫羅《支那人氣質》(1943年3月13日)、井岡咀芳《滿支習俗考》(1943年5月21日)、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1943年6月5日)、平原北堂著《支那思想史》(興亞思想全集)(1943年6月7日)等亦進行閱讀。

《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67)的時間橫跨總力戰前後, 除一九三八年一月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以日語為主, 其他則以中文為主時而混雜台語語彙。本文藉由爬梳戰前日記, 可略窺他的「支那」閱讀。中日戰爭爆發後在中文圖書的出版幾乎不可能, 大多只能以日文寫作出版, 當時台灣作家曾將一些中國古典名著翻譯成日文出版, 如黃得時改譯《水滸傳》, 楊遠翻譯《三國演義》, 劉頑樁《岳飛》、黃宗葵翻譯《木蘭從軍》等⁴⁷, 台灣新文學作家們試圖從禁用漢文政策的縫隙中, 展開中國通俗白話小說的日譯, 而如此的日譯活動之所以可能, 不外乎是受到戰時「支那」出版環境的影響。因為根據黃得時改譯的《水滸傳》訴諸讀者的廣告詞「為了瞭解支那根據他的代表性文學瞭解它的生活和思想是最能觸及真相的。」可窺得出版社的出版動機(《台灣文學》第3卷第2

完成這個目的, 對於最大的鄰國中國我們得更加了解。」可見此書的發行乃是打著「大東亞建設」之名義, 趁此時勢而推出的譯作。

⁴⁶ 葉石濤於〈日治時代《紅樓夢》在台灣〉中, 談到張深切、呂赫若談過閱讀《紅樓夢》的經驗, 此外他本人與妻子亦皆閱讀過岩波文庫的《紅樓夢》的日譯本。參見葉石濤,《追憶文學歲月》(台北:九歌, 1999年8月)。

⁴⁷ 辛廣偉,《台灣出版史》(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5月), 頁16。

號)。而清水書店亦在以台灣作家為主的《台灣文學》上刊登佐藤春夫譯注《平妖傳》(《台灣文學》第4卷第1號,頁47)、中島孤島譯編《改訂西遊記》(頁94)的廣告。《吳新榮日記全集》中記載「台灣藝術社因出版《西遊記》而大賺了錢。因此他願在文化方面犧牲一些無所謂」(1942年8月16日),又「和徐清吉、黃庚申兩位和父親、我坐在客廳聊天,若無其事的在談《三國誌》、《水滸傳》。」(1942年4月15日)可見,戰時為滿足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讀者群的需求,日譯本曾普遍流通於台灣島內的讀書市場中。

島內的日譯中國通俗小說雖多少滿足閱讀「支那」的慾望,但吳新榮仍習慣直接向內地出版社郵購書籍,或請居住於日本內地的親友代購「支那」相關書籍,譬如:《唯物史觀支那史》、《支那古代社會史論》、《吾國與吾民》、《赤色支那》、《東洋古代文化史談》、《支那醫學史》、《蔣介石》、《支那及び支那人》、《現代支那批評》等。同時,從日記內容可感受到中日開戰之際吳新榮的苦悶心境,而閱讀是他排遣抑鬱瞭解戰況的手段之一。他的「支那」閱讀活動與日本戰時出版業者有系統地出版「支那」相關研究書籍有其密切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後漢文閱讀人口萎縮,台人透過中文獲取中國知識的路徑受到阻礙,從日記閱讀履歷可知,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唯有仰賴帝國選擇性的文化譯介出版,方能取得中國文化、歷史等相關資訊。面對中日戰爭爆發後,《吳新榮日記全集》中記載著:

我每次讀書,便對自己的精神墮落感到自責,感嘆這時代的苦悶與行動的無力。今起兩三天內,決心讀破《唯物史觀支那史》。⁴⁸

我們相信歷史是波動的,現在正處於波底,下一波必會在波峰!因此,我們將樂觀地在下一個時代迎接欣喜的和平之到來。⁴⁹

⁴⁸ 1938年1月15日。引自: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2》,頁11。

⁴⁹ 1938年1月20日。出處同上註,頁13。

其中，可知中日戰爭時台灣知識份子夾雜在殖民宗主國與祖國間的尷尬處境和無奈感，除了相信和平即將到來之外，透過閱讀認識「支那」也是他們綜觀全域安頓自我的方法之一。日記中他直言個人讀後感和書評，譬如：

讀完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此書並無如我期待的給我們好教誨。唯一佩服的是作者的博識與對中國民族的缺點攻擊得體無完膚。雖然他一再提倡中國固有文化，但最後極力主張中國唯有法治才能得救。此說令人感服。若說我讀此書的感想，則一言以蔽之：中國民族不會亡。⁵⁰

威爾斯的《世界文化史大系》、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這本石川三四郎的《東洋古代文化史談》，是我歷史研究之根源與文化認知之書籍吧。⁵¹

今天讀完了石丸藤太著《蔣介石》。昨天讀過的《汪兆銘》著重於日支事變後，而這本《蔣介石》則寫事變之前。兩者都以日本人客觀公平的立場做正確的評傳。《汪兆銘》的作者稱汪兆銘為聖人，而《蔣介石》的作者則稱蔣介石為偉人，可謂好對稱。這聖人和偉人如今各走各的路而左右了中國的命運，又可說是很諷刺。我想與其稱他們為聖人、偉人，倒不如以英雄政治家來得貼切。此二人將以各自的特長，來處理中國的未來。⁵²

今天也收到中央公論社寄來的尾崎秀實的《現代支那批評》和村上知行的《支那與支那人》兩書。驚訝於印刷裝訂的精美。前者著眼於政治、經濟方面；後者是社會文化方面的論述都與支那問題相關，是我愛讀的書。可謂現代日本的支那通的雙璧。⁵³

⁵⁰ 1939年4月20日。引自：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3》，頁63。

⁵¹ 1939年8月15日。出處同上註，頁110。

⁵² 1940年6月10日。引自：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4》，頁73。

⁵³ 1940年7月12日。出處同上註，頁86。

今天讀完了佐藤春夫的《支那雜記》。此人理解支那文，愛支那的詩，但不瞭解支那這個國家，也不喜歡支那人，這是怎麼一回事？雖然如此，我也多少被養成愛朗讀詩的心情，但對於賣弄文字的隨筆很不喜歡。⁵⁴

根據上述引述，可知身為殖民地台灣知識份子的吳新榮相當關心當時的中國情勢與政局轉變，並勤於對中國的政經社會、歷史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的認識與瞭解，甚至記述中國共產史《赤色支那》⁵⁵亦是有所涉獵。對當時的名人蔣介石和汪兆銘有其個人的評定。而「回顧中國歷史，我設定如下八聖：帝／周文王／孔子／老子／李世民／李白／岳飛／孫文若舉臺灣的一聖：鄭成功／再加上現代的誰：○○○則可成為十聖。」（1939年6月23日）可知，戰時他對中國文化認同甚深，思考中國文化道統體系時，亦將台灣的聖人納入其中。同時，也將詩仙李白納入其中，可知他對詩人的重視程度。總之，他在閱讀「支那」的同時，亦對台灣的未來命運多所思考。

王詩琅在他的回憶文⁵⁶中很清楚地勾勒出台灣知識份子如何透過中文書籍與日文書籍，統合多語的知識來源路徑從而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有關外國文學的翻譯，他並不讀中文譯本，而選讀日譯本。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王詩琅最熟悉還是魯迅，因有私塾漢文的學養基礎使他得以直接閱讀魯迅的雜感、郁達夫的〈沉淪〉等。他雖也曾試圖翻譯矛盾的〈子夜〉，但只翻譯了幾頁，便因前往中國而停筆。張冬芳亦曾在《台灣文學》上日譯老舍〈離婚〉的第一、二章⁵⁷，但因刊物停刊而作罷。可見，中國現代文學除了魯迅文學之外，戰時在台的日譯本傳播不似古典通俗小說文學那般熱絡。而這股在台古典通俗小說的翻譯熱與台灣大眾文學之間的關係，則有待進一步釐清。

上述的《呂赫若日記》和《吳新榮日記全集》中所提及的「支那」書籍出版年份，大都是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四〇年代前半的出版品。因此可知他們的閱讀取向與因戰爭而發展出的「支那」知識的出版傳播，有著密切的

⁵⁴ 1943年9月12日。引自：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7》，頁83。

⁵⁵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東京：高山書院，1938年）。

⁵⁶ 下村作次郎編、蔡易達譯，〈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弘文館，1996年11月）。

⁵⁷ 老舍著，張冬芳譯，〈離婚〉（第一章、第二章），《台灣文學》第3卷第3號（1943年7月）。

關係。一九三七年台雖然漢文欄被廢止，以中文傳遞中國古典或現代文學的資訊迴路受阻，但是它們卻轉以日文為媒介繼續使中國知識在台灣文學場域中流通。雖然一切的「近代」知識被日語所統馭，但殖民地知識份子卻利用日本活絡的出版流通，戰時「支那」出版的有利條件，尋求另一種獲得「中國」知識閱讀傳播的路徑，建構屬於他們的精神系譜。

五、結語

「圓本」全集、文庫本滿足殖民地作家閱讀世界文學和思潮的閱讀慾望，提供他們累積文化資本的物質條件。從作家的藏書、訪談、日記中足以窺見他們部分的閱讀行為和閱讀經歷。而現存的殖民地作家的書房藏書價值不單是書籍物體本身，同時也留存帝國知識體系在殖民地流布、播遷、展演的意義。

戰前台灣作家的翻譯活動，相較於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致力於翻譯工作者並不多，除了台灣讀書消費市場規模不大之外，也與台灣讀者具中文或日文外語能力有關，他們可以直接借助中譯本或是日譯本，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因而翻譯的必要性反被削弱。譯本的流通因戰爭的關係，使得輸台的中日譯本在數量上必有所消長。因讀者教育背景和世代的差異，如受過私塾漢文教育並曾受過中國白話文洗禮的世代（如賴和等人）；完全以日語創作的日語世代（如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等人）；跨語世代（如葉石濤、林亨泰、陳千武等人），對譯本的選用皆受限於個人對中日文的熟稔度而互異，其中戰後的跨語世代不少是藉由中譯本學習中文。戰後初期雜誌甚至以中日文對照編排方式，如《新新》、《中華》等，而中日對照譯本，如東華書局出版的中日文對照文藝叢書，除了沈從文的作品之外，由楊逵一人戮力進行日譯中國三〇年代作家，透過翻譯活動轉介中、日文化。可見，台灣知識份子在個人的知識體系的建置活動或跨語活動中，與譯本的選讀有其相當密切的關係。

台灣新文學運動中，雖然作家大都借助中譯本和日譯本大量汲取世界文學的養分，但是如賴和、楊逵、張我軍等人卻曾積極地投入譯介外國文學思潮⁵⁸。

⁵⁸ 鄧慧恩，《日據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新竹：國立

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文學在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為試圖消解日本中心／台灣邊緣的殖民關係，試圖借「日語」之便，進入世界文學之林。戰時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纛下張星建也意識到翻譯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重要性，他認為「本島為保有作為南方共榮圈基地的樣子，今後將致力於獨自文化的創造，非得提升島民的一般生活到世界水準不可。而且鑒於本島的特殊性，非得計畫振興翻譯文化不可。」⁵⁹同時，他也提及張深切和呂赫若皆著手進行翻譯的工作。可知，總力戰時期的譯介活動、作家的創作與台灣文學建構自我文化主體，三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戰爭末期的譯介語言只能選擇帝國語言日語，無法使用在地的台灣話文回饋「大眾」，使台灣話文成為進入敘事層次⁶⁰，譯作只能滿足日語閱讀群的需求。物質文化隨著帝國主義入主台灣讀書文化市場之後，台灣的譯介活動日漸被收編進入帝國語言文化體系中，相對於此殖民地原有語言（中文／台灣話文）的譯介活動更形萎縮，遑論透過翻譯活動獲取殖民近代化的自主性。日語閱讀活動成為台灣文化通往近代化的一條重要路徑。戰後陳儀政府禁用日語之所以引起台灣知識份子的強烈反彈，不外乎這一條與世界文化接軌的路徑被斷絕。

帝國出版產業界基於本位主義的物質流通，卻意外開拓殖民地知識青年閱讀視野，提供他們開闊的世界想像，同時也形塑了一部分的殖民地知識體系。在這形塑的過程中，他們並非是完全是被動地接受，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透過閱讀積累文化資本，轉而反省殖民社會體制，對帝國展開批判。為了不讓台灣本土文化完全被收編進入日本文化中，強調台灣的「特殊性」與展望未來的「世界性」，是他們慣用的論述模式，希望以此來解消殖民時期來自同化運動的壓制，乃至戰後初期亦以同樣的模式面對中國化的當局壓力。而透過釐清他們的閱讀經歷，窺見日治時期知識份子文化教養積累過程，他們共同努力深化現代台灣文化的足跡便顯得清晰可見。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

⁵⁹ 張星建，〈翻譯文學について〉，《台灣文學》第2卷第1號（1942年2月）。

⁶⁰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北：INK印刻出版），頁190-237。